

編後語

長期以來，「五四」是中國知識份子的精神聖地。以「德先生」和「賽先生」為偶像的「五四啟蒙」精神，在1980年代中後期，一時間風光無限。然而，自1989年中國以及蘇聯東歐發生鉅變之後，「五四啟蒙」的命運也發生詭異的變化。在五四運動九十年後的今天，「五四」的精神魅力似乎有所減弱。

本期的「二十一世紀評論」欄目，刊發了四篇風格迥異的文章，關注「五四啟蒙」精神在當代中國的命運。作為「五四啟蒙」精神最為核心而重要的遺產，自由主義在當代中國竟然趨於式微。何包鋼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自由主義基本上是一種反專制的解構性思潮，未能制度化為一種建構性的學說和實踐，對眾多重大問題，例如民族認同、國家建設、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協商民主等，要麼自動讓出話語的陣地，要麼固守過時的教條，自然會命運不濟。

自1989年以來，「五四啟蒙」受到了多方的責難。據高全喜的分析，儘管五四運動以降的啟蒙是一種錯誤的啟蒙，或至少是偏頗的啟蒙，但是對啟蒙的責難與否定，恐怕問題更多。現在中國思想界要改弦易轍，不是不要啟蒙，而是應該尋找一條正確的啟蒙路線。這其中，如何面對中國的國情，創造性地研究、探索、吸收蘇格蘭啟蒙運動的經驗，汲取法蘭西啟蒙運動的教訓，是當務之急。

實際上，中國人對不同啟蒙運動思想資源的吸收，早在五四時代就存在。高力克的文章梳理了陳獨秀與杜亞泉的思想差異，敘述了清末民初的調和主義如何在新文化運動的洗禮下向激進主義轉變的歷史過程。在某種意義上，「五四啟蒙」更具有法蘭西的烙印，而崇尚英國思想與氣質的杜亞泉儘管也是當時的名人，但海內外很少有歷史學家視之為「五四知識份子」。

「五四啟蒙」與法國啟蒙運動的可比性是一個饒有興味的問題。陳方正的深入比較發現，中國和法國啟蒙運動具有一些共同的特質：都是自發的思想運動，同樣受到外來的刺激，而且「外來者」都是英國。在不同的時期，面對軍事和思想力量的戲劇性大逆轉，中國和法國以大體相似的方式迸發出新思潮，並以大體類似的方式走向激進化。對這種巧合及其後果的反思才剛剛開始。

當然，「五四」並不僅僅是啟蒙精神的盛宴。本期「百年中國與世界」欄目刊載了三篇文章，均以生動的筆調，分別描繪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對日常生活的影響、抵制日貨運動的始末與是非，以及中國傳統再發現的現代意涵。

除了「五四」九十周年之外，2009年還是「六四」的二十周年。與「五四」相比，「六四」並沒有引起學者同等規模的研究。本期的「政治與法律」欄目選刊了趙鼎新的文章，從社會學的視角，分析了學生與政府、學生與知識份子乃至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揭示出八九學生運動的激進化是當時任何個人都無法左右的過程。值得注意的是，推動當時學運激進化的一些結構性因素，在當今的中國依然存在。